

论《宋文鉴》^{*}

巩本栋

提 要 本文认为,吕祖谦编纂《宋文鉴》,虽“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但吕氏所谓“道”,实内涵丰富,并不仅限于理学一端;其所谓“治体”,不限于北宋朝廷的“家法”和新旧党争的是非恩怨,还寓含着编者对国家社稷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其所谓“文”,也不只是论道议政之文,而是更主张文质兼备、事辞相称,以选录名家名作为主,而兼及其它,重视保存文献,反映了其对北宋文学发展面貌的认识。

关键词 吕祖谦 《宋文鉴》 道学 治政 文章

《宋文鉴》是南宋吕祖谦于淳熙年间奉旨编纂、在当时曾引起过激烈争议、而在后世却得到广泛流传的一部诗文总集。其书编纂的缘起和过程如何,在编纂的宗旨、体例上有什么特点,其刊刻、流传的情形以及其价值和地位,又应当如何认识等,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 实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

绍兴三十一年(1162)六月,宋孝宗赵昚即位,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宋孝宗曾颇欲有一番作为,文学上亦然。^② 他性喜诗书,尤好苏轼文章,至“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③ 淳熙四年十一月,宋孝宗先曾命知临安府赵磻老校订、刊印江钊所编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ZD130。

^① 《宋文鉴》刚一编成,即引起激烈争论,吕祖谦自谓“《文海》奏篇,异数便蕃,一时纷纷。”(《东莱文集·外集》卷6《与李侍郎仁父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详参吕祖谦《进编次〈文海〉札子》、《谢赐银绢除直秘阁表》、崔敦诗《进重删定吕祖谦所编〈文鉴〉札子》、《朱子语类》卷122、叶适《习学记言》卷47至50、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文鉴》”条等。然自南宋以后,是书为学者接受,得到广泛流传,刊本甚多,少有争议。至当代,撰文讨论《宋文鉴》的学者主要有王学泰、陈广胜两位先生,所撰之文颇有启发性。前者所撰《〈宋文鉴〉的编刻与时政》一文(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4期),注意到《宋文鉴》的编纂与南宋孝宗朝政治的关系,然尚未能对是书作全面讨论,而认为“《宋文鉴》是一部为元佑党人翻案的书”的看法,还可商量。后者撰有《吕祖谦与〈宋文鉴〉》一文(载《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论述了吕祖谦史学和政治思想等对《宋文鉴》编纂的影响,然过于简略。

^② 参见《宋史》卷33《孝宗本纪》。

^③ 《文忠苏轼文集序》,见宋施元之、顾禧、施宿撰,严一萍、郑骞编《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卷首,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69年版。

《圣宋文海》,赵氏辞不能任,由参知政事王淮推荐,遂改命吕祖谦。然吕祖谦以为《宋文海》原为坊间所刊,选文既不够精当,文字亦多错讹,建议增删修订后再行刊印。^①宋孝宗同意了吕氏的请求。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吕祖谦在江氏原书的基础上,博采旁收诸家文集、传记及其它文献,选汰删定,以类编排,纂成新的《圣宋文海》一百五十卷,目录四卷,上呈宋孝宗。孝宗大为赞扬,除吕祖谦直秘阁,赐银绢三百两匹,并接受周必大的建议,改书名为《皇朝文鉴》,命周必大作序,^②下令刊行。

然事有曲折。宋孝宗要给吕祖谦加官,中书舍人陈騤起初却不肯起草制词,以为直秘阁乃清要之选,不可轻与;孝宗下诏刊印此书,却又有朝臣上疏启奏,指责书中“所取之诗,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有借古讽今之嫌“所载章疏,皆指祖宗过举”,尤不可取。^③以至于宋孝宗也觉得所选奏疏中,像邹浩的《谏哲宗立刘后疏》,措辞有些过于激烈了。^④于是,孝宗便又命崔敦诗对书中的奏疏部份进行修订。崔敦诗对原书所选宋仁宗朝以下的奏疏重作调整,“取其缓而不切者删之,别摭要而有体者增之”,^⑤并对部份篇目的文字进行了删节、校正,至于其它部份,则并未改动。由于这些原因,不但是书的刊刻一时延宕下来,而且也引起了朝野上下的许多议论。

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书中所选的奏疏问题上。除有臣僚密奏之外,又有张栻,在其《答朱元晦书》说道:“伯恭近遣人送药与之,未回。渠爱敝精神于闲文字中,徒自损,何益?如编《文海》,何补于治道?何补于后学?徒使精力困于翻阅,亦可怜耳。承当编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当专意存养,此非特是养病之方也。”^⑥这里当然有对友人患病的同情,但对《宋文鉴》一书却是全盘否定。有意思的是,张栻认为此书无补于治道,然肯定此书的人,恰恰是认为它有益于治道,尤其是书中所选的奏疏。宋孝宗最初对校刊《圣宋文海》并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只是当吕祖谦提出重编是书的时候,他才认为应当多选些“有益于治道”的文章。^⑦而当是书编成投进后,宋孝宗称其“采取精详”,并对吕祖谦赏赐有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且如奏议之精,有益于治道”,“故以

① 此据吕祖谦《进编次文海札子》。周必大也认为江钊原书编选未当,应委派馆阁之臣重新编选后再行刊刻,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文鉴》”条。

② 据朱熹所说,《宋文鉴》初由丘密作序。参见《朱子语类》卷122。然是序已不存。

③ 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宋文鉴》卷首,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67年版。

④ 邹浩认为宋哲宗废孟后,立刘妃为后,不免“上累圣德”,应“以万世公议为足畏”,收回成命。文原见《道乡集》卷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王称《东都事略》卷100等,《宋文鉴》卷61收此文。

⑤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21《中书舍人兼侍讲直学士院崔公墓志铭序》,明谓崔敦诗曾奉诏“更定吕祖谦所编《文鉴》中羣臣奏议,其增损去留,率有意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文鉴》”条,也说孝宗所命修订此书者为崔敦诗。朱熹论《宋文鉴》,亦谈到崔敦诗修订《宋文鉴》事(见《朱子语类》卷122)。而今本崔敦礼《宫教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却收有《进重删定吕祖谦所编《文鉴》札子》一篇。《宫教集》为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是书卷4、卷5所收表启奏札等,多为代人之作,故此文或为崔敦诗所作,而误入《宫教集》,或由崔敦礼代敦诗撰,尚不能定。

⑥ 《南轩集》卷2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

宠命”。^① 后来赵汝愚以为书中所收奏议过于简略,又编《国朝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得到宋孝宗的赞赏。^② 朱熹晚年与学者论及此书,也称赞“其所载奏议,亦皆繫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盖非《经济录》之比也”。^③ 同样是肯定书中奏疏的编选恰当,有益于治道。

二

问题还得从吕祖谦的编纂宗旨谈起。与吕祖谦同时的叶适,曾盛称吕氏编《宋文鉴》“盖自古类书未有善于此”者,并论及此书的编纂宗旨,颇堪注意。其曰:

按上世以道为治,而文出于其中。战国至秦,道统放灭,自无可论,后世可论惟汉唐。然既不知以道为治,当时见于文者,往往讹杂乖戾,各恣私情,极其所到,便为雄长。类次者复不能归一,以为文正当尔。华忘实,巧伤正,荡流不反,于义理愈害,而治道愈远矣。此书刊落浩穰者,百存一二。苟其义无所考,虽甚文不录;或于事有所该,虽稍质不废。鉅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邃见收。合而论之,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余以旧所闻于吕氏,又推言之,学者可以览焉。然则谓莊周、相如为文章宗者,司马迁、韩愈之过也。^④

叶适所言,既本之于吕祖谦,自然最为可信。吕祖谦编纂《宋文鉴》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以道为治,而文出于其中”,或“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即凡是符合儒家礼义道德、有益于治政的文章,便多在编选之列,而言不及义、无补治政的“虚文”,即使具有文采,也弃之不取。

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吕祖谦又制订了一些编选原则和具体的编选体例。这些体例,据吕祖谦自道以及周必大、吕乔年等人的记述,大致有九:

一、“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

二、“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⑤

三、“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苏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派,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四、“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五“《文鉴》”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赵汝愚《进国朝名臣奏议序》“臣仰惟陛下天资睿明,圣学渊懿,顾非羣臣所能仰望。而若稽古训,虚受直言,二纪于兹,积勤不倦。尝命馆阁儒臣编类《国朝文鉴》,奏疏百五十六篇,犹病其太略。兹不以臣既愚且陋,复许之,尽献其书。万机余闲,幸赐紬绎。”(《宋朝名臣奏议》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赵氏所编上呈后,宋孝宗认为可与《资治通鉴》媲美(参王应麟《玉海》卷61《艺文》)。在吕祖谦之前,陈确即曾于干道二年编《名臣奏议》20卷上呈宋孝宗,受到奖励。此后李壁亦曾编《国朝中兴诸臣奏议》450卷。可见当日君臣对奏议的重视。

③ 《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经济录》,当指赵汝愚所编《皇朝名臣经济奏议》,即《国朝诸臣奏议》。

④ 叶适《习学记言》卷4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周必大《文忠集》卷104《皇朝文鉴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子语类》卷122亦载:“伯恭《文鉴》,有正编其文理之佳者。”

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①

五、“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

六、“又尝谓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韩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则可以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赋》,亦未能侈国家之盛,止是别无作者,不得已而取之”②;

七、“虽不知名氏而其文可录者,用《文选》古诗十九首例,并行编类”③;

八、“复谓律赋经义,国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④;

九、“若断自渡江以前,盖其年之已远,议论之已定,定而无去取之嫌也。”⑤

《宋文鉴》的体例,其实尚不止这些。叶适就说“此书二千五百余篇,纲条大者十数,义类百数。”⑥比如,书中各类文章的编排,大致依作者生活的年代先后为序;少数诗文,吕祖谦选入时有删节等。关于《宋文鉴》编选体例的确定,吕祖谦曾与朱熹讨论过,朱熹不但认为其书“体例甚当”,而且还曾提出过一些具体意见,可见吕氏对编纂是书的郑重。⑦

从上述体例中对文质或事辞兼备的强调来看,吕祖谦虽主张以道为治和文章须有益于治政,主张文辞需服从于事与义,但在他的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事辞相称、文质彬彬之作,不得以而求其次,才是质胜于文的文章。可见他并不轻视文采。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它也是对编选宗旨的一个重要补充。吕祖谦编纂是书,虽所悬目标甚高,然而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取舍上,他又认为应从创作实际出发,兼顾到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类型与体裁,不没其人,不没其作,不以人废言,不强求一律。这些看法,同样是很公允和很通达的,可与其编选宗旨相参。

三

宋朝文治最盛,宋太祖时已显示出崇儒倾向。宋太宗增修国子监,组织儒学之士大规模修书,崇儒意向也很明显。宋仁宗即位,更是大力兴学。不仅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招生的范围有极大的扩展,而且地方上的官学也所在多有,庆历三年,他下诏“州府军监应有学处,并须拣选有文行学官讲说,不得因循废罢”。⑧庆历四年,他又下诏说“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弊,

① 《朱子语类》卷122曰“有其文虽不甚佳,而其人贤名微,恐其泯没,亦编其一二篇者。”可参。

② 以上《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

③ 吕祖谦《东莱集》卷3《进编次〈文海〉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周必大《文忠集》卷104《皇朝文鉴序》。

⑤ 《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

⑥ 叶适《习学记言》卷50。

⑦ 引文见《晦庵集》卷34《答吕伯恭书》。同时,朱熹也提出过一些具体建议。如“《文海》条例甚当,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种文胜而义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为虚文而不说义理者,却不妨耳。佛老文字恐须如欧阳公《登真观记》、曾子固《仙都观菜园记》(案吕氏未选欧阳修此文,卷79选曾巩《仙都观三门记》)之属乃可入,其它赞邪害正者,文词虽工,恐皆不可取也。盖此书一成,便为永逮传布,司去取之权者,其所担当,亦不减《纲目》,非细事也。况在今日,将以为从容说议、开发聪明之助,尤不可杂置异端邪说于其间也。”以至南宋周密就说“吕氏《文鉴》,去取多朱(熹)意。”(《浩然斋雅谈》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宋会要辑稿·崇儒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以尽学者之才。有司其务严训导,精察举,以称朕意。学者其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其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由是州郡奉诏兴学而士有所劝”,“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①因此,终南北宋一代,儒家士大夫人才辈出,学派众多,成就辉煌,影响深远。

吕祖谦为北宋名臣吕夷简之后,有深厚的家学渊源,^②思想学术上既承关、洛之统绪,以理学为宗,又经史文章,博通兼擅,折衷诸说,自成一家,同时还主张经世致用,不废事功。时与张栻、朱熹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因而,他编纂《宋文鉴》所提出的“以道为治”的“道”,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并不仅仅限于理学一端,可以说举凡儒家关于天地山川的自然物理,正心诚意的心性学说,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以及忠孝节义、师友爱悌、宽厚仁慈、谦恭退让等方面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俱在其中。其选诗文,也首重反映和表现上述儒家思想和观念的作品。

吕祖谦在《宋文鉴》(卷119)中选了程颢著名的《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在此书中,程氏明确提出“性无内外”的观点,并认为“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反映了其理学的特点。吕祖谦又选了程颢旨在“正学”的《颜乐亭》诗和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视听言动四箴并序》等。程颐《视箴》(《宋文鉴》卷72)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之为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其所讲说的,正是正心诚意,“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的道理。其它如所选吕大临的《克己铭》(《宋文鉴》卷73),也是要讲,只要能心存乎诚,便可达到“洞然八荒,皆在我闾。孰曰天下,不归吾仁”的境界。而张载的《西铭》、《东铭》,其所传达的,更是儒者应有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的博大胸怀。至于周敦颐《太极图说》、廖偁《洪范论》、欧阳修《泰誓》、刘敞《士相见义》等,则又往往包含了其对儒家经义的独特理解。而邵雍《闲行吟》(《宋文鉴》卷25)所言:“长忆当年扫敝庐,未尝三径草荒芜。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否泰悟来知进退,乾坤悟了识亲疎。自从会得环中意,闲气胸中一点无。”^③则又是抒发他自己学为圣人之道的心得。

然而,书中所选诗文,更多地讲论的还是儒家士人在实际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所应恪守的礼义道德和行为规范。像《宋文鉴》(卷73)中晏殊的《几铭》、韩琦的《昼锦堂》等,皆志存“忠孝”。种放的《端居赋》(《宋文鉴》卷1),自警“得丧不忘于明圣,颠沛必思于正直”,而向敏中《留别知己序》、贾同《原古》、郑褒《原祭》、陈尧《原孝》、司马光《功名论》、蔡襄《明礼》、张载《鞠歌行》、《君子行》、苏舜钦《感兴》、苏轼《劝亲睦策》、王令《师说》、王安国《师友策》、潘兴嗣《师道》、彭汝砺《沐浴有感》、徐积《濉阳》、谢逸《闺恨》诗等很多

① 《宋史》卷157《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按吕氏家族,自吕公着起,入于《宋元学案》者就有十七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中说“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门人,而希哲自为《荜阳学案》。荜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弼中,别见《和靖学案》。荜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见《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其中尚未包括吕好问。由此可略见其深厚的家学渊源。

③ 朱熹认为邵雍还有些说理的好诗,像“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等,吕祖谦尚未编入,十分可惜。参《朱子语类》卷100。

作品,他们所要言说的,也都是儒家伦理纲常中的要目。其中有些作品,文质兼备,多有可取。如陈师道《观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宋文鉴》卷19),以“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抒发对其师曾巩的敬重之情。而著名的《妾薄命》,更体现了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至为感人。颜太初的《许希》诗,在良医许希与京城市利之徒的扬抑之间,告戒士人不应忘其所本《东州逸党》,倡为儒学,抨击放荡不拘礼法的所谓东州逸党,同样具有警戒世风的作用。

书中有一些诗文,其所表现的,已不完全属于传统的儒家礼义道德,而是传达了宋儒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一种新的追求,一种新的士风。像苏轼的《于潜僧绿筠轩》(《宋文鉴》卷13),即是一例。诗曰: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诗意虽用晋王徽之语生发,但苏轼的阐释,却是宋儒式的,即士不可俗。正如黄庭坚所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①黄庭坚的阐释,当然又加入了他自己的理解,然主张不俗,却与苏轼一致,而与晋人所追求的风度不同。

儒家士人历来重视教育,宋代兴学之风尤盛,《宋文鉴》中所选戒子和兴学重教一类的作品亦多。典型的如范质的《诫儿侄八百字》(《宋文鉴》卷4):

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战战复兢兢,造次必于是。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常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戒尔远耻辱,恭则近乎礼。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相鼠与茅鴟,宜鉴诗人刺。戒尔勿放旷,放旷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齐梁尚清议。南朝称八达,千载秽青史。戒尔勿嗜酒,狂药非佳味。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古今倾败者,历历皆可记。戒尔勿多言,多言者众忌。苟不慎枢机,灾危从此始。是非毁誉间,适足为身累。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忿怨容易生,风波当时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举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气。不知承奉者,以尔为翫戏。所以古人疾,蓬除与威施。举世重任侠,呼俗为气义。为人赴急难,往往陷刑死。所以马援书,殷勤戒诸子。举世贱清素,奉身好华侈。肥马衣轻裘,扬扬过闾里。虽得市童怜,还为识者鄙。我本羁旅臣,遭逢尧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怀忧畏。深渊与薄冰,蹈之惟恐坠。尔曹当悯我,勿使增罪戾。闭门敛踪迹,缩首避名势。名势不久居,毕竟何足恃。物盛必有衰,有隆还有替。速成不坚牢,亟走多颠蹶。灼灼园中花,早发还先委。迟迟涧畔松,郁郁含晚翠。赋命有疾徐,青云难力致。寄语谢诸郎,躁进徒为耳。

孝悌、勤学、恭谨、恬淡等等,其所反映的,无非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观念。其它像种放的《谕蒙诗》、向敏中《留别知己序》、晏殊《中园赋》、韩琦《阅古堂记》、文彦博《晁错论》、富弼《答陈推官书》、孙复《谕学》诗、欧阳修《读书》诗、邵雍的《戒子孙》、《女戒》等,和书中大量入选的学记之作(如欧阳修《吉州新学记》、王安石《潭州新学》、曾巩《筠州学记》、李

^① 《山谷集·别集》卷10《书嵇叔夜诗与侄榘》。类似的表述,又见于《山谷集》卷29《书缙卷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觐《袁州学记》、苏轼《南安军学记》等),也都能体现编选者的企向。

因以儒学为宗,所以对赞颂历史上著名人物和北宋一代名儒的作品,也多加选录。前者如苏轼《屈原庙赋》、宋祁《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司马光《河间献王赞》、刘敞《西汉三名儒赞》、《朱云》、陈师道《孔北海赞》、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狄遵度《杜甫赞》、王禹偁《怀贤诗》等;后者如苏轼《表忠观碑》、《王元之画像赞》、黄庭坚《王元之真赞》、《濂溪诗》、刘敞《王沂公祠堂记》、王回《李泰伯画赞》等,皆是其例。其中尤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抒写北宋儒者气象的作品。像范仲淹的《赴桐庐郡至淮上遇风》(《宋文鉴》卷22):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舟楫颠危甚,蛟龙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像这样的作品,至今读之仍能想见当日这位“平生仗忠义”的士大夫形象,更不用说他著名的《岳阳楼记》了。

有意味的是,吕祖谦所选也并不完全是反映儒家思想的作品,他还选了不少体现老庄尚拙黜巧、委运任命、知足保和等思想的诗文,反映出其思想的博杂。如周敦颐在《拙者赋》(《宋文鉴》卷5)中写道“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此虽是要抑制浮靡轻薄的世风,然已融入老庄之说无疑。王曾有感于矮松以形陋而不夭斤斧,而作《矮松赋》,末曰:“客有系而称曰:材之良兮,梓匠之攸贵;生之全兮,蒙庄之所美。苟入用于钩绳,宁委迹于尘滓;俾其天性而称珍,曷若存身而受祉:纷异趣兮谁与归,当去彼而取此。”(《宋文鉴》卷1)它如晏殊《〈列子〉有〈力命〉》,王充《论衡》有《命禄》,极言必定之数。览之有感》、潘兴嗣《逍遥亭》、贺铸《烛蛾》等,亦可略见老庄思想在宋代在儒家士人思想中的地位。

四

吕祖谦主张“以道为治”,在书中选入了一些讲论和体现儒家义理的诗文,但他更为重视的,还是儒学的经世致用,而非空谈义理或拘拘于经义传注。乾道六年,吕祖谦在上呈宋孝宗的《轮对札子》中就说“夫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圣道之兴,指日可俟。”希望宋孝宗能“留意于圣学也。陛下所当留意者,夫岂鈇槩传注之间哉,宅心制事,祇畏兢业,顺帝之则,是圣学也;亲贤远佞,陟降废置,好恶不偏,是圣学也;规模审定,图始虑终,不躁不挠,是圣学也。陛下诚留意此学,日就月将,缉熙光明,实理所在,陛下当自知之而自信之矣。”^①其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很明显。

所以,他会将那些讲论君臣治政之理、描绘人们心目中理想政治和歌颂美政的作品,收入书中。如王回的《责难赋》、《爱人赋》、《事君赋》,^②王安石的《周公论》,程颢的《论君道》、《论王霸》、许安世的《公生明赋》,林希的《佚道使民赋》等,所展示的,便是君圣臣贤的理想政治图景。徐铉的《君臣论》、《持权论》、《师臣论》,田锡《论军国机要朝廷大体疏》,韩琦《论时事》,宋祁的《请复唐馭幕之制疏》,司马光的《论治身治国所先》、刘敞的

^① 《东莱集》卷3《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其一。

^② 叶适《习学记言》卷47载“闻之吕氏:读王深父文字,使人长一格。《事君》、《责难》、《爱人》、《抱关》诸赋,可以熟玩。”

《赏罚论》、《患盗论》、《贤论》、程颐《论经筵事》等等,具体讨论的是如何才能达到君圣臣贤、国富民强的目标的问题,可谓多“思虑精密,考验深遽”。^①而苏辙、秦观的《黄楼赋》等,则歌颂的是一方守臣的美政。

他又对反映北宋王朝一代典章制度和盛世的阔大气象的文章,格外留意。宋室南渡,人们渴望中兴,对北宋自太祖、太宗以来的治政和气象乃至昔日帝都的繁荣等,均充满了眷怀之情。编选北宋一代的文章,以为南宋治政的借鉴,自然不能忽略了这一类文章。像刘筠的《大酺赋》(《宋文鉴》卷2),颂有宋盛德,“述海内丰盛,兆庶欢康”。晏殊的《中园赋》(《宋文鉴》卷2),谓“予生兮曷为,幸亲逢乎盛时。进宽大治之责,退有上农之赏。求中道于先民,乐鸿钧于圣期。”范仲淹的《明堂赋》(《宋文鉴》卷2),描绘天子明堂“广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观,揭三宫之中央,昭壮丽于神州,宣英茂于皇猷,颁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诸侯者也。”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则是歌颂宋朝恩德广被,四夷为其所化。而梁周翰的《五凤楼赋》(《宋文鉴》卷1),所赋虽不无讽谏之意,但其中所描绘的“不壮不丽,岂传万世”的北宋帝都气象,也着实令人向往。杨侃的《皇畿赋》、丁谓《大搜赋》、宋祁《王畿千里赋》、张咏《声赋》、范镇《大报天赋》、刘攽《鸿庆宫三圣殿赋》、张耒《大礼庆成赋》、吕大钧《天下为一家赋》、王仲敷《南都赋》等,皆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佚名《建隆登极赦文》、王珪《治平立皇太子赦文》、邓润甫《元丰立皇太子赦文》和名臣除授的诏制、谢表之文,尹洙的《皇雅十章》、《天监四章》、《宪古二章》、《帝籍二章》、《庶工三章》、《帝制五章》、《皇治三章》、《太平一章》等,也都是能见一代治体和气象的代表作。

他还对劝农、悯农的诗文,特别关注。《宋文鉴》卷一收录了王禹偁的《籍田赋》。赋中写太宗于东郊行劝耕之仪,“千官景从,风清尘而习习,雨洒道以蒙蒙。时也木德,盛阳气充,春芒甲坼,青青兮葱葱;春土脉起,油油兮溶溶。冠盖蔽野,佩环咽风。”此固是一时盛事,不妨撰文赞颂。然无论举行此种仪式本身或王氏撰文的目的,都更在于“务农桑兮为政本,兴礼节兮崇教资。民乃力穡,岁无阻饥。神农斲木之功,我其申矣;后稷播时之利,我得兼之”,而非这些礼仪本身。卷五十九收范祖禹《论农事》一疏,谓“国朝祖宗以来,尤重农穡。”其中引宋太宗语,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悯。春蚕既登,并功纺织,而缁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穗,充其腹者,不过疏粝。若风雨乖候,稼穡不登,将如之何?”吕氏编选的用意很显然,那就是劝农悯农。宋仁宗天圣元年,春寒伤农,钱惟演任西京留守,曾作《春雪赋》(《宋文鉴》卷1),表达了应“以民为心”的思想。苏轼贬居海南,仍作《和陶渊明劝农》(《宋文鉴》卷12),劝说海南之民勉力耕作,“春无遗勤,秋有后冀”。尤值得称道。其它同情民生疾苦之作,书中所选甚多。如,张舜民观打麦而赋诗《打麦》(《宋文鉴》卷13)云“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许彦国《秋雨叹》(《宋文鉴》卷14)望秋雨而叹“田家黍穗未暇悲,茅屋且为萤火飞。”久旱得雨,欧阳修作《喜雨》(《宋文鉴》卷15)诗道“及时一日雨,终岁饱丰穰。”见官吏催租,苏轼作《禽言》(《宋文鉴》卷13)悯之“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穀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酷暑难耐,张耒能想到劳苦百姓,其《劳歌》(《宋文鉴》卷14)云:“忽怜长街负重民,筋骸长彀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饱儿女。人家牛马系高

^① 叶适《习学记言》卷48引吕祖谦评宋祁《请复唐驮幕之制疏》语。

木,惜恐奔驱犯炎酷。天工作民良久难,谁知不如牛马福。”

他如陈烈《题灯》、文同《织妇怨》、王安石《新田》、刘敞《闵雨》、《荒田行》、沈括《江南曲》、晁补之《豆叶黄》、张咏《悼蜀诗四十韵》、范仲淹《四民诗》、《江上渔者》、叶清臣《悯农》、梅尧臣《县斋对雪》、《送王介甫知毗陵诗》、李觏《衰老妇》、刘敞《检覆郟城旱田示同官及寄河南诸贤》、谢景初《余姚董役海堤有作》、黄庭坚《和孔常父雪》、陈师道《田家》等等,皆反映出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之心。而欧阳修对造成百姓贫苦原因所作的思考,也值得注意。在《奉答子華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宋文鉴》卷15)中,他写道:

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费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壤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纲纪遂纷纭。坦坦万里疆,蚩蚩九州岛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以贫。疾小不加理,浸淫将徧身。

揭示出北宋土风、政风因循不作为的一面。至如刘敞的《古风》(《宋文鉴》卷12)诗,则不仅在悯农了,更把锋芒指向了不公正的世风:“子欲富矣,何用为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子欲贵矣,何用为贵?德不若名,名不若势。粹兮纯兮,三五之人兮。终窶且贫兮,孰知其珍兮。”其激烈言辞背后的酸辛,亦可想见。

五

北宋一代治政,若就宋朝内部而言,最重要的,无疑是发生在庆历和熙、丰年间的两次激烈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了。吕祖谦编《宋文鉴》,自然不能回避。

北宋的历史进程发展到真宗、仁宗之世,其积贫积弱的情况已越来越明显,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宋仁宗、宋神宗和统治集团各个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从维护宋王朝及其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开始酝酿和提出挽救社会危机的设想,希望在思想和政治上进行一番改革。

早在宋仁宗景佑元年二月,知制诰李淑在《上时政十议》中,已向仁宗提出修人事、节开支、重视农业、阅武习兵等建议。^①宝元二年五月,贾昌朝、韩琦都上疏劝宋仁宗要带头节省开支。十一月,宋祁又上疏论政,首当其冲的是“三冗三费”。庆历二年五月,欧阳修则上疏专论御兵三弊,主张改革选兵用将对敌之策。而全面分析北宋面临的内外矛盾,提出具体改革措施的则是范仲淹和王安石,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史实,无须赘述。这里我们略举程颢、程颐等人的看法,以见当日变法实在是势在必行。程颐在嘉佑二年有《上仁宗皇帝书》,书中认为,“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者乎?”因而建议仁宗“应时而作”,“出于圣断,勿询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②到熙丰变法开始的时候,程颢还一度任职三司条例司,具体参与变法措施的制定。熙丰二年,任监察御史里行的程颢,曾连连上书驳斥反对变法的言论,指出“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慎,易于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慎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哉?自古以来,何尝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返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

② 《河南程氏文集》卷5。

智勇,体干刚而独断,霁然不疑,则万世幸甚!”^①显然,二程都认为变法势在必行,并力劝仁宗打消顾虑,放手改革,建立功业。其实,宋仁宗、宋神宗又何尝没有看到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改变呢?从庆历三年七月始,仁宗就下诏让范仲淹、富弼、韩琦等“讲时政得失”,“条奏当世务”。^②庆历革新失败后没多久,庆历八年二月,仁宗又诏诸臣献计献策,以图改革。诏曰:“间者西陲御备,天下绎骚,趣募兵师,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累于兹,公私匱乏。如以承平寢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阙少,……思济此务,罔知所从,悉为朕条画之。”^③至于神宗,一即位便“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④,“奋然将雪数世之耻”^⑤。所以,不论是庆历革新,还是继之而起的熙丰变法,当时人人都以为势在必行,正如陈亮所说“方庆历、嘉佑,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⑥朱熹也说“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⑦确是实情。

关于庆历革新,吕祖谦在《宋文鉴》中选了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辨滕宗谅、张亢》、《近名论》,韩琦《论减省冗费疏》、《论时事疏》,富弼《论辨邪正》,欧阳修《论杜、韩、范、富》、《朋党论》、《为君难》,蔡襄《论增置谏官疏》、梅尧臣《灵乌赋》,石介《庆历圣德颂》等。显而易见,他对庆历革新的认识,与北宋以降大多数士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即赞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革新,而对庆历革新时因循守旧派(此派恰以吕夷简为首)的政治观点,并不认可。

但对熙、丰变法,吕祖谦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了。其所选奏议书论中,虽收有王安石的《论本朝百年无事》、周邦彦的《汴都赋》等,但反对新法、新党的文章,却占了绝大多数。像韩琦的《论时事》、《论青苗》,吕诲《论王安石疏》,司马光《应诏言朝政阙失疏》、《与王介甫书》,苏洵《辨奸论》,程颢《论十事》、《论新法》,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辙《上皇帝书》、《论吕惠卿》、《论分别邪正》,刘摯《论人才》、《论分析助役》,郑侠《论新法进流民图》,范祖禹《论听政》,邹浩《谏立后疏》,陈瓘《论蔡京》,任伯雨《论章惇蔡卞》、刘跂《谢昭雪表》等,都是旧党论新法、论王安石等新党人士言辞最激烈的文字。

在变法革新这样的大问题上,议论有异同,原属正常。因为当日诸人虽同朝为官,其政治和思想学术却有不同。比如王安石,他在思想学术上推尊孟子,主张以养心为本,与此相应,在政治上亦提出取法先王,通圣人之心,力行王道,而认为只要能这样去做,就可以不求财利而财利自然随之,就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程颢、程颐的政治理想似乎也是要以先王为法,行尧舜之治,但如果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他们的侧重点与出发点与王安石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所着眼和强调的实为法“先王之学”、“圣人之言”和圣人之德,并用这些来衡量和规定君王的施政方向,因而往往过于执着行迹。所以,一见王安石那些意

① 《河南程氏文集》卷1《论王霸札子》。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143。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3。

④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宋史》卷16《神宗本纪》。

⑥ 《陈亮集》卷12《铨选资格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⑦ 《朱子语类》卷13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在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他们并未认真地去“审其初”,便一概视为兴利,痛加针砭,不留余地,使双方思想政治上的矛盾和隔阂愈益增加。程颐的弟子曾记录过这样一段话“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有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①这段对话十分形象地描绘出王、程两家思想见解和政治理想的异同。再如司马光,他特重天命,又主张中和之道,并把这种天命论、中和论推衍到政治领域,主张一切听从天命,守祖宗法度、循规蹈矩,无过无不及,反对“务求新奇,各事改张”。^②苏轼的政治理想不高。晁说之曾说“王荆公著书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则,而东坡所言,但较量汉唐而已。”^③这是不错的。苏轼所以有这种主张法汉唐之治而不赞同高阔慕古的政治理想,与其思想方法上的中庸之论有关。与司马光较为接近。在政治生活中,他主张凡事应从人之情性出发,顺乎自然,名副其实,宽猛相济,无过无不及。^④

王安石、程颢程颐、司马光、苏轼诸人的政治理想既然不同,也就必然会造成其在具体措施上、尤其在对待变法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争竞不已,终于导致分党结派。到了元祐年间,旧党上台,尽废新法,原本不同思想政治派别的斗争,掺杂进许多人事、意气之争。绍圣后,新法性质已变,新旧两党,相互倾轧。至蔡京专权,朝政已无可为。而这一切,当日士人多归咎于王安石新学、新法,吕祖谦也认为此种“国是”,“其年之已远,议论之已定,定而无去取之嫌也”。其实这只是倾向于北宋理学家和旧党一派的观点。

吕祖谦在思想学术和政治上都是不赞同王安石的观点的。比如,王安石要法先王之治,行周公之政,吕祖谦就不以为然。他认为修身养性是学问的根本,学问应从内向外做,^⑤应在实处下功夫,应为有用之学,^⑥“揖先儒淳固慤实之余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约,自下而高”,方是正途。因而认为王安石之学“高自贤圣”,殊不可取。^⑦据叶适回忆,他曾与吕祖谦谈到前辈士人王曾、欧阳修的高尚志节。“王曾既中第。或谓状元三场,一生吃着不尽。王正色拒之,以为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后生学者传以为口实。欧阳修既执政,人有贺之者,答以惟不思而得与既得而不患失。然余病其侵寻于官职矣。而吕氏嫌此论太高,余亦不敢竟其说而止。”^⑧吕祖谦平生不作高论,于此可见。所以,王安石的一些文章,如《谢宰相表》,或称为“近世第一”,然吕祖谦则认为它不过是“大言之尤者,不可为后生法”,^⑨书中便不收。其它像《明妃曲》,欧阳修的和作可以收,而议论大胆的王安石的原作,却不收。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系列政治施为,吕氏也是反对的。因而,他又会偏于旧党一派,在书中大量选录旧党人士批评新法的文章,以至于书始编成,即为人诟病。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思想政治观点不同,原可讨论,编选者要表达自己的思想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19。

② 《温国文正公文集》卷45《应诏言朝廷阙失事》,《四部丛刊》本。

③ 《晁氏客语》,《说郛》(宛委山堂)本。

④ 关于诸家思想的主要异同,笔者曾在《北宋党争的再评价及其思想史意义》(载《思想家》第一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故此处不再赘论,读者可以参考。

⑤ 参《左氏传说》卷四。

⑥ 参《左氏传说》卷一。

⑦ 《东莱集》卷6《白鹿洞书院记》。

⑧ 叶适《习学记言》卷50。

⑨ 叶适《习学记言》卷49。

政治见解,也可以理解。然而像吕祖谦在《宋文鉴》中收吕晦的《论王安石》、苏洵《辨奸论》等涉嫌人身攻击的文章,似乎就不够妥当了。

不过,吕祖谦在《宋文鉴》中还是选了王安石论新法以及其它方面的很多作品,尤其是他的五言古诗、七言律绝和诏、表、制诰、书启等文章。又比如,书中还收入了周邦彦的《汴都赋》,而周邦彦正是因为这篇歌颂新法的大赋,才得到宋神宗和宋哲宗两朝皇帝的眷顾的。另外一些新党人士(如吕惠卿、蔡确等)的作品,书中也有收录。这些,当然都与吕祖谦虽“以闾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的思想学术有关。^①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吕祖谦在《宋文鉴》中选入了大量的奏议类文章,并不完全是要表达党派之见。叶适在《习学记言》(卷49)中曾记其“览《宋文鉴》所选”名臣奏议至范祖禹《听政疏》言“今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此十数语,可为涕流。盖国家存亡,从是决矣。余尝与吕氏极论累日,终无救法。”可见吕祖谦编纂是书实寓含着一种对国家社稷的前途和命运的忧患意识。

再看游酢的《论士风》。其曰:

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始则众笑之,少则人惑之,从则天下相与而效之,莫之以为非也。士风之壤,一至于此,则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杀人而谋其身可为也,迷国以成其私可为也。草窃奸宄,夺攘矫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赖乎?古人有言,礼义廉耻,谓之四维。四维不张,国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节,则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议于天下。士有顽顿无耻,一不容于清议者,将不得齿于缙绅,亲戚以为羞,乡党以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义者,宁饥饿不能出门户,而不敢丧节;宁厄穷终身不得闻达,而不敢败名。廉耻之俗成,而忠义之风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②

其论士风之与治政的密切关系,极为深刻。再如吕陶的《请罢国子司业黄隐任职疏》(《宋文鉴》卷61)亦谓“士之大患,在于随时俯仰,而好恶不公,近则隳丧廉耻,远则败坏风俗,此礼义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也是切肤之谈。最终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当然非止一端,但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我们看来,也许不是熙丰变法,也不是新旧党争本身,而是在新旧党争中、尤其是被蔡京之流败坏了的士风。风气既坏,复之甚难。游酢一文是元符三年上呈宋徽宗的,惜不为重视,而北宋的结局,也不幸为游氏所言中。

吕祖谦在书中颇收录了一些理学家的作品。如孙复、李觏、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人的作品,因而被时人指责为虽将“前辈名人之文搜罗殆尽,有通经而不能文词,亦以表奏厕其间,以自矜党同伐异之功。”^③其实,这样的批评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吕祖谦编书本不是要以文词取胜。而且,有些作品的收录,也不完全是党同伐异的问题,而是确能见出吕祖谦的编选眼光。比如,《宋文鉴》中收了不少理学家的诗歌,其中有些索然无味的说理诗,或写景抒情附上一可有可无的理学的尾巴,固然是不可取,然说理而有机趣,耐人

①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② 《宋文鉴》卷61,个别语句据《宋名臣奏议集》卷24改。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文鉴》”条。

寻味,说理而能见理学家澄澈洒脱的胸襟,便同样是好诗,何况理学家的诗也并非都是说理。以理学诗人邵雍为例,其《冬至》(《宋文鉴》卷23)诗曰:“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此际易得意,其间难下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诗本写节序,却借题说知微见着的道理,也是写得巧。是书第25卷中,收入邵雍诗数十首,其中《观盛化》二首其一,描绘北宋王朝的盛世景象:“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寻常巷陌犹簪绂,取次园林亦管弦。人老太平春未老,莺花无害日高眠。”《安乐窝》、《懒起》,抒发理学家的寻常生活情趣:“安乐窝中三月期,老来纔会惜芳菲。自知一赏有分付,谁让万金无子遗。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这般意思难名状,只恐人间都未知。”都平易自然,而别有意趣。再像程颢的《秋日偶成》(《宋文鉴》卷25):“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起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云烟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偶成》(《宋文鉴》卷28):“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也都是能见出理学家胸襟和气象的好诗。至于另外一些文章,如苏轼的《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和吕惠卿自己的《建宁军节度副使谢上表》等,文笔工巧,同样有所可取。

六

吕祖谦的诗文创作,今见于《东莱集》者,数量并不多,然如四库馆臣所称,“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①是大致符合实际的。吕祖谦又编有《古文关键》一书,讨论文章作法,辨析文章源流,自南宋以来,影响极广。所以,他编《宋文鉴》,不但显示出很高的文学识鉴水平,而且也是主张文质兼备、事辞相称的。

吕祖谦最初不满意江钊所编的《圣宋文海》,认为“名贤高文大册尚多遗落,遂具札子乞一就增损”,^②在编选《宋文鉴》的过程中,选录了大量的名家之作,而这些作品,是能够反映北宋一代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和成就的。以诗而论,书中所选,如林逋《小园梅花》、《梅花》,清丽工巧。杨亿《汉武》、钱惟演《禁中庭树》等,典赡雅丽。欧阳修《明妃曲》、《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紫石屏歌寄苏子美》、《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等,因为多为赠答之作,所以风格虽不似其它作品平易自然,然纡徐婉转的议论,仍是欧阳修诗的本色。梅尧臣的《泛溪》、《闻雁》、《发匀陵》等,平淡而有蕴藉,在梅诗中有相当的代表性。苏舜钦的《永叔月石砚屏歌》、《淮中晚泊犊头》、《夏意》,前一首风格豪迈,显示出其风格的主要倾向,后二首是其政治上遭受挫折后的所作,风格清幽冷峻,自与前者不同。王安石的诗,吕祖谦选得较多的是古体和绝句,像《桃源行》、《食黍行》、《杜甫画像》、《虎图》等,议论风生,古拙拗峭,都是王安石的代表作。而《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题西太一宫》、《金陵即事》、《杏花》等,或为写景,必婉丽精妙;或为咏史,则必以议论取胜。苏轼的诗,书中选得最多。其中像《法惠寺横翠阁》、《书王定国所藏烟江迭嶂图》、《司马君实独乐园》、《和钱安道寄惠建茶》、《韩干马十四匹》、《虢国夫人夜游图》、《郭熙

① 清永瑆等《四库全书·东莱集提要》。

② 《东莱集》卷3《进编次〈文海〉札子》。

画秋山平远(潞公为跋尾)》、《新城道中》、《雪后书北台二首》、《祭常山回小猎》、《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望湖楼醉书》、《题澄迈驿通潮阁》等,纵横捭阖,恣意抒写,而无所不可。黄庭坚的诗,书中选得也比较多。如《和子瞻粲字韵二首》、《题竹石牧牛》、《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送范德孺知庆州》、《武昌松风阁》、《书磨崖碑后》、《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赠杨明叔》、《寄黄几复》、《蚁蝶图》、《病起荆江亭即事》等,奇崛拗峭,颇能代表黄诗的特色和成就。^① 还有刘敞的《离忧赋》、《小孤山》诗,陈师道的《妾薄命》、《别三子》、《示三子》等,也无不是流传甚广的佳作。凡此,皆可见吕祖谦编选眼光的高明和文学思想的取向。

再以文而论,如王禹偁《待漏院记》、《竹楼记》,范仲淹《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韩琦《定州阅古堂记》,欧阳修《朋党论》、《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相州昼锦堂记》、《与尹师鲁》、《答吴充秀才》,苏舜钦《沧浪亭记》,王安石《论本朝百年无事》、《书〈洪范传〉后》、《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司马光《独乐园记》,苏洵《张尚书画像记》、《木山记》,曾巩《筠州学记》,苏轼《墨君堂记》、《净因院画记》、《李氏山房藏书记》、《文与可画篋筍谷偃竹记》、《黄州再祭文与可》、《表忠观碑》、《文与可飞白赞》,苏辙《黄州快哉亭记》,黄庭坚《大雅堂记》、《与王观复书》等等,不胜枚举,亦可略见北宋散文发展的成就。

吕祖谦不但在《宋文鉴》中多收名家名作,而且还特别注意选收记载这些名臣、名儒生平行事的制诰、章表、传记、行状、墓志等文章。例如,书卷34至36为制文,所收多为名臣除授制词,像赵普、吕蒙正、文彦博、韩琦、吕公弼、曾公亮、王德用、富弼、陈升之、司马光、吕公着、范纯仁、曾布等,皆在其内。又如卷133至135所收祭文类,收欧阳修所撰《祭尹师鲁文》、《祭苏子美文》、《祭范文正公文》、《祭石曼卿文》诸文,收曾巩《祭欧阳少师文》、《祭王平甫文》,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黄州再祭文与可文》,苏辙《祭亡兄端明文》等。卷136行状类,收宋祁《张文定公行状》、苏轼《司马温公行状》、程颐《程伯淳行状》等。卷139至148计十卷,亦多为名臣名儒的墓志铭和神道碑铭。其编选倾向显而易见。

史称“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② 而吕祖谦编《宋文鉴》,亦表现出明显的保存文献的意识。他不仅在书中选录了大量的名家名作,而且还选了一些不以文章名世的士人的作品。如种放、杜衍、司马池、孙复、范纯仁、王安石、陆佃、李常、孙觉、李觏等人,虽多为北宋名臣或名儒,却少有人注意其亦时有诗文佳作,吕祖谦让人们看到了他们的另一面。如司马池的诗《行色》:“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赖得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可谓能状难写之景。^③ 周敦颐《同宋复古游大林寺》、陈尧佐《松江》等,写景亦多清丽工整。另有一些士人,名位或不振,创作或不多,然其作倘有可取,书中也尽量收入,以诗存人。像鲍钦止《雨余》、林敏修《张牧之竹溪》、曹绎《山行》、叶涛《望旧庐有感》、鲍当《酬阮逸诗卷》、马存《村老》、曹纬《自齐山借舟泛湖还家》等,都是其

① 吕祖谦一向推崇苏轼、黄庭坚的文学创作,认为“诗文必以苏黄为法”(《晦庵集》卷33《答吕伯恭书》“示喻曲折”)。这与朱熹的观点是不同的。

②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③ 司马光《温公诗话》以此语称之。

例。

吕祖谦保存文献的意识,还突出地表现在选收一些对前人或时人著述和书画进行评价的诗文,尤其是序跋之文。如欧阳修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迭嶂图》、《书晁说之考牧图后》,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陪谢师厚游范文正公祠》,张耒《孙彦古画风雨山水歌》,高荷《见黄太史》等。书中收各类“序”文多达八卷(卷85至卷92),其中绝大多数为书序,此不赘举。其中一些后来失传的著作,仅赖此以存其相关信息。如陈抟《易龙图》、《柳如景文集》、《释秘演诗集》、《惟俨文集》、《庆历兵录》,李淑《邯郸图书十志》、《龟绎先生诗集》、《钱塘勤上人诗集》、《仁宗御书》、《孙莘老易传》、王回《故迹遗文》等,多已不可见,其序便尤为珍贵。

七

吕祖谦受命编纂《宋文鉴》,前后虽不过一年,然他“穷日翻阅,它事皆废”,^①甚费心思,并曾与朱熹、叶适等人往来商讨。所以,他自己颇为看重。而叶适也认为“后有欲明吕氏之学者,宜于此求之矣”。^②其实,是书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吕祖谦以理学为宗而博杂、务实的思想学术倾向,而且还蕴含着了一层更深刻的用意。

淳熙四年,吕祖谦在上呈宋孝宗的《轮对札子》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

臣窃惟国朝治体,有逮过前代者,有视前代犹未备者。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当俶扰艰虞之后,其效方见。如东晋之在江左,内难相寻,曾无宁岁。自驻驂东南以来,踰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谓逮过前代者也。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畧未优。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如西夏元昊之难,汉唐谋臣,从容可办。以范仲淹、韩琦之贤,皆一时选,曾莫能平殄,则事功不竞可知矣。此所谓视前代犹未备者也。陛下慨然念黜耻之未复,版图之未归,故留意功实,将以增益治体之所未备,至于本朝立国之根本,盖未尝忘也。

(略)其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励而振起;其逮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③

吕祖谦既希望宋孝宗能“留意功实”,“激励振起”,以补“前代犹未备者”,更认为他应该不忘“宽大忠厚”、“礼逊节义”的立国之本,并“爱护而扶持”之,以“建立规模”、“成就风俗”,承继和超越前代之治。由此看来,吕祖谦之编纂《宋文鉴》,实在是蕴含了他期望以此来承继、建构和发扬自北宋以来所形成和确立的以文为治、宽大仁厚的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的良苦用心的。

围绕吕祖谦《宋文鉴》的编纂,在当时曾引起过不少争论,然事实却证明,《宋文鉴》和吕祖谦的编纂宗旨与思想,稍后即为人们所接受,《宋文鉴》也得到广泛的流传。吕祖谦《宋文鉴》编成后,因受臣僚非议,宋孝宗命崔敦诗对其中的奏疏进行删削,并未刊印。但

① 《东莱集·别集》卷8《与朱侍讲书》“某馆下碌碌”。

② 叶适《习学记言》卷50。

③ 《东莱集》卷3《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其二。

崔敦诗的删改本并未流传,而吕祖谦原编本却从宫中流出,^①不胫而走,由坊间和官府一再刊刻。至今所知,在南宋即有吕氏家塾本、麻沙刘将仕宅刊本、庆元六年(1200年)太平府刊本、嘉泰四年(1204年)新安郡斋刊本、嘉定十五年(1222年)重修新安郡本、端平元年(1234年)再次重修新安郡本等。^②可以说为数众多。这种情况,在南宋除三苏诗文的刊刻之外,几无书能比。元明以后,各种翻刻本更是层出不穷。而经吕祖谦《宋文鉴》所选录的许多作品,此后也不断地为其它诗文选本所接受,名家名作不必说,尤其是那些理学家和其它原不以文名世的士人作品,如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晏殊、种放、寇准、王珪、司马池、叶清臣等人的作品,多是如此。还有一些原来虽有文名然后世却影响不广的作家作品,也因此选而渐为人所知。如郑文宝、张咏、崔伯易、刘敞兄弟、郭祥正、王安国、王令、韩维、黄庶、米芾等人的作品。此外,有些无文集传世的作家作品,更是赖此书以传。如梁周翰的《五凤楼》、夏侯嘉正《洞庭赋》、钱惟演《春雪赋》、王回《事君赋》、崔伯易《感山赋》以及周邦彦的《汴都赋》等,皆为其例。后来清人编《宋诗纪事》等大型宋人总集,也多对其加以利用。凡此,皆可见《宋文鉴》在后世流传与接受的大致情形。

总之,我们以为,此书的编纂宗旨虽是“以道为治,而文出于其中”,但吕氏所谓“道”,实内涵丰富,并不仅限于理学一端;其所谓“治”,不仅限于北宋新旧党争的是非恩怨,还寓含着编者对国家社稷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其所谓“文”,也不只是论道议政之文,而是主张文质兼备、事辞相称,以选录名家名作为主,而兼及其它,注意保存文献,反映了其对北宋文学发展整体面貌的认识。因此,《宋文鉴》既体现了吕祖谦以理学为宗而博杂、务实的思想学术倾向,更寄托了他期望以此来承继、建构和发扬自北宋以来所形成和确立的以文为治、宽大仁厚的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的良苦用心。

(作者通讯地址: 巩本栋 南京 南京大学文学院 210093)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东莱修《文鉴》成,独进一本于上前,满朝皆未得见,惟大珙甘昺有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或最初此书即由甘氏传出。另,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也在当时士大夫间即有传本。

② 详参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